

1508



女史外史資料

第十一輯



文登文史资料

第十一辑

文登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

编审 王世启 刘登明

主编 王国泉

责任编辑 王国泉 张玉强

2040/06

目 录

人 物 传 记

- 当代“大禹”——林一山……………湖涌（1）
怀念老校长——杨升东组稿
 忆老校长……………臧同运 姜祖显 许光复（19）
 怀念杨校长……………安家正（24）
 杨升东校长二三事……………邢治勤（32）
 一个难忘的不眠之夜……………吴汝努（36）

英 雄 史 话

- “济南第一团”和昆崙山红军游击队……………刘中华（41）
在朝鲜战场上的优秀师政委——张玉华……………盛星辉（55）
首次夜间击落美机的侯书军……………盛星辉（64）

海 外 名 人

- 炎黄之光
——记旅居巴西侨领、华商巨擘毕务国
……………马成广 王国泉（68）

风 土 民 俗

文登传统节日文化志……………张亭均 王国泉(85)

委 员 风 采

甘当人民的老黄牛……………黄国永(101)

默默撒播人间希望

——记国家有突出贡献的骨伤科专家、文登整骨医院

院长 孙文学……………原锋(112)

当代“大禹”——林一山

湖 涌

立志治服蛟龙

1949年夏天，一个拥有一万四千人的南下干部团从北京出发，直奔中南地区。团长是谭政，副团长是陶铸、陈正人、邵式平，秘书长是林一山。林一山的终点是广西，给张云逸当副手，担任广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

林一山，1911年出生于山东省文登市林村。早年在中学时代，他就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在北师大读书时，他参加过“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不久，他被任命为北师大第二任地下党支部书记。抗战期间，他与理琪、吕志恒、于得水等同志一起组织领导了闻名胶东的天福山起义，创立了“山东人民抗日救国军第三军”，后又担任过中共胶东特区的武装部队司令。抗战胜利后，他调任辽南省委书记兼辽南省军区政治委员等职。

他个头中等，右手腕在抗战时著名的雷神庙战斗中伤残，肌肉萎缩，几乎无缚鸡之力。但山东人民特有的坚毅、倔强在他身上却得到了继承。解放前夕，他不畏权势，曾和“东北王”高岗在政治原则问题上进行过斗争，幸有陈云保护，才免遭厄运。

恰在这年夏天，一场特大洪水席卷了长江流域，中下游

灾情尤为严重。鄂、湘、赣、皖、苏沿江堤圩纷纷溃决，呼啸的洪水泛滥成灾，村庄被荡平，田园被冲毁，人畜淹死无其数。很多幸存的灾民无房可居，无粮可食，均以蕨根、螺丝、榆皮、观音土充饥……

当南下的火车喘着沉重的粗气缓缓驶进汉口车站时，林一山突然接到命令：组织上决定他留下来治理长江，担任中南水利部部长，并组建中南水利部以及长江水利委员会。他二话没说，坚决服从，并力争兼任了长江水利委员会总工程师。

1950年盛夏，总部设在汉口长春街的长江流域规划办公室（简称为“长办”），当时是政务院的一个办公室，林一山任主任。一张大型长江流域规划挂图，几张旧办公桌，构成了中国人与江奋斗的新的长江开发指挥中枢。

隔行如隔山，林一山昔日在北师大学的是地理专业。这又何妨？“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他将韩愈的这句名言录于玻璃板下。为了更好地行使治理长江的总工程师的职权，他老老实实当起了工程师们的学生。

“从大禹治水到如今，长江的洪灾大约一共有过多少次？”林一山开始向专家问讯。一位工程师告诉他说：据史书记载，从公元前185年到1911年的2096年中，长江中下游平原地区共发生大洪灾214次，平均10年就有一次。从洪灾密度看，越往后期，水灾次数越近越密。唐代平均18年一次，宋朝和元朝平均五、六年一次，明清时期平均4年一次，而1931年至1949年，则发生较大洪灾7次，平均两年半就有一次。

两年半就有一次较大洪灾？林一山的心似遭猛然一击，

这就是人们赖以生存的长江么？林一山查阅和研究了大量资料，深深认识到：千百年来，长江就是以洪水猛兽，喜怒无常，纵横改道而载入史册的，几乎两岸所有地带都有长江狂暴时拜访的痕迹。当洪水象一群群虎狼倾泄入城时，眨眼功夫即把满城精华一洗成空，以至十余年元气不复。洪水水位最高时，坐在城头上就能在水中洗脚。即便是“鬼城”丰都也无法幸免。水龙王怒气冲天时，大水也要冲进“阎王庙”的十八重地域。儿时，老师把曲曲折折的长江画在黑板上，教人懂得了“九曲回肠”，而在林一山今天的体验中，美丽的长江甚至已演化成恶魔。长江洪灾竟有如此野蛮的破坏力，远甚于一场大规模的战争。看来，要想治服这条桀骜不驯的蛟龙，必得象解放战争那样，非通过几场大的战役是不可能的。

然而，与以往打仗不同的，这需要科学！需要专业技术！于是，林一山以他的深思熟虑，将长江流域规划队伍的知识建设作为组建工作的内在目标。在长江流域规划委员会成立大会上，他发表了一段催人奋发的演说：“新中国成立后，我们要搞建设了。万里长江需要人才，从今天开始，从我开始，没有文化的先学文化，有文化基础的要学习一两门专业。任何人不得例外。否则，新中国的建设事业就没有你的位置，长江也不要吃白饭的人。”他断然宣布：“在建设事业中，我愿意用一百个老布尔什维克，去换一个哪怕是资产阶级的实干家。”

“老林呀，你怎么能那样嚷嚷？”他夫人张彬在台下听着为他捏一把冷汗，回到家劈头就这么一句。“怎么啦？列宁就是这么说的！”他不以为然。任重道远，他没有时间左顾右

盼，他顾不得妻子的担心。有了，议论就让他去议论，有人上告就让他上告去，他概不理睬，集中精力潜心研究治江良策。

长江万里长，险段在荆江。180公里的土质荆江大堤，是江汉平原10万亩良田和800万人民的卫士，它用身躯护卫着中南重镇武汉及沙市。它若溃决，将造成无法估量的损失。刚刚过去的1949年大洪水，使荆江大堤险象环生，祁家垸堤段曾有大滑坡，半边堤身塌入长江，造成令人咋舌的险情。幸亏江水当时开始回落，避免了一场难以设想的决口。

林一山上任不久，就着重研究荆江防洪问题。经过勘察、分析和初步论证，他提出了荆江分洪工程方案。

建国伊始，百废待兴，国家财力非常紧张，但长江防洪更迫在眉睫。1950年国庆节那天，中南局代理书记邓子恢，政务院副总理薄一波，向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汇报了《荆江分洪工程技术设计草案》。毛泽东对这个工程设计方案甚感兴趣。他一连几天仔细通览和审阅了工程设计书，随后，委派专人找到林一山，就工程的问题作了系统的了解。来人问及：“这项工程能够保用多少年？”林一山很有把握地回答：“可保用40到100年。”得到林一山充满自信的答复，毛泽东很满意，感叹道：“够了，20年足够了！”毛泽东作为政府主席当即批准实施这个方案。

1952年4月，荆江分洪工程正式动工。唐天际为总指挥，王树声、林一山、许子威为副总指挥，李先念为总政委。毛泽东亲自题词祝贺：“为公共利益，争取荆江分洪工程的胜利！”周恩来也题词祝贺：“要使江湖都对人民

有利。”

由于党中央大力支持，一个惊人的奇迹出现在长江边：壮观的荆江分洪工程只用了三个月就全部竣工。1954年，荆江分洪工程三次启闸分洪，使沙市最高水位降低了0.96米，为保证荆江大堤的安全和武汉防汛的成功，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三峡工程必须建，须早建

如何从根本上治服长江这条桀骜不驯的蛟龙？林一山与一些专家们很早就看好三峡地区的防洪蓄水作用，高天上顿生三峡梦。自从作起三峡梦，他便有了许多机会与共和国的决策人直接接触。

1953年2月19日，身穿银灰色大衣的毛泽东，在一些干部的簇拥下，从汉口江汉关附近的一个专轮码头上登上了“长江”舰，在“洛阳”舰的护卫下，缓缓离港，向东驶去。

在二楼卧舱里，毛泽东亲切地会见了林一山。他询问了林一山右手受伤等情况后，打开地图，先和林一山研究南水北调的问题，然后又研究长江洪灾问题。当林一山展开《长江流域水利资源综合利用规划草图》，指着图上大大小小水库的标记向毛泽东汇报时，毛泽东左手插在腰间，举起右手，在图上划了个大圆圈：“太好了，太好了！修这许多水库，都加起来你看能不能抵上三峡一个水库呢？”林一山很认真地给予了回答：“这些水库都加起来，抵不上三峡一个水库。”毛泽东正是基于这个事实，生发了要用一个工程将长江卡起来的奇想。毛泽东用手掌连连击向三峡出口：

“就先修那个三峡水库，怎么样？”林一山怎么也不敢在建国初期就往修建巨大工程上想，他一下子便兴奋起来：

“主席，我们很希望这样，但现在还不敢这样想。”

毛泽东又问了三峡工程的造价、工期等问题后，笑着握住林一山的手：“我这算了解了长江的许多问题和知识了，谢谢你。在今天之前，我就考虑过三峡问题。不过，关于三峡问题，你先不要向中央分管这项工作的同志汇报，我现在只是摸摸底，还不考虑正式进行这项工作，现在主要是抓南水北调。”

林一山在自己的领袖身边，感受到他的呼吸，感受到他打算在更彻底的程度上解决长江治理问题的信心。之后，三峡工程的念头无时无刻不萦绕在林一山的心间，他想得很多，想得很具体。不过真正促使毛泽东下气力思考三峡工程以及由中央决定规划它，是1954年那场特大洪灾。毛泽东面对特大洪水，面对一份额特急电报，面对不得不扒开十一处长江堤口，面对荆江分洪惊愕不已。夜深了，案前长江灾情报告令他锁着眉头一遍又一遍翻阅，难以放下。毛泽东心头一沉，禁不住两眼发热。1949年的大洪灾尚且记忆犹新，仅隔五年又来了一场更大的洪灾！由此看来，共和国要大步前进，不根除长江洪涝这一心腹之患，将国无宁日，人无宁日。他重重地把烟头按熄在烟缸里，下决心把长江流域的治理当做重点工作来考虑。

灾难就象一只巨掌也将林一山推入洪流。他比任何时候都急切体验到要解救长江中下游人民，必尽早修建三峡工程。洪水还未退尽，他便召集四方八路将领共商三峡工程大计。

这年12月中旬的一天傍晚，又一次会晤，林一山匆匆赶到火车上。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全都等着他汇报。毛泽东似乎对一切问题都要搞个透彻，一个一个细问下来，没有停顿。其中，毛泽东特别问道：“三峡工程在技术上有可能吗？”林一山回答十分恳切：“如果中央要在较早的时期内部署，依靠自己的力量，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可以建成。”

有一件事最能体现林一山的性格。那是在1958年1月南宁会议上，毛泽东听说林一山与燃料工业部水电总局李锐局长在三峡问题上有不同见解，并为之红了脸。李锐认为：江河防洪，堤防的作用是主要的，是古今中外一切大江大河最有效的措施，长江的出路是先众多的支流上修建小水库群，投资少，见效快，收益早；并建议要维护长江“黄金水道”的航行价值。只有在条件成熟后再考虑对干流的开发利用。毛泽东以他惯有的深入了解客观情况的作风，立即派专机把他俩接到南宁，当面锣对面鼓作了问讯。林一山的斗胆是出了名的。即使是在毛泽东面前，他也直抒胸襟，毫不含糊。

谈到三峡工程问题，毛泽东便风趣地对林一山说：“你的信我看了，你怎么说怕写多了呀？我是很关心长江和三峡的嘛！”当林一山汇报到工程造价时，博闻强记的毛泽东指着资料说：“怎么少了，过去不是这个数。”林一山告诉他说：“经过多次测算，本着省着点的基本点，有些突破。”毛泽东一听高兴了，“能不能再少一些啊？50亿元包干行不行？”林一山想，过去是提80多亿元，后来省成72亿元，“主席，50亿元按现有的技术水平还做不到。”他

摇摇头说。毛泽东不吱声了，连吸了几口烟。在场的周恩来碰了碰林一山的胳膊。王任重却提醒他说：“你这个林一山呀，现在只是个可行性方案，你就那么死？万事万物都会有变化的嘛！”林一山的拗劲又上来了，他劈劈啪啪罗列了一大堆：“72亿是工程师们推算出来的……考虑到将来物价、工资会有变动，工程造价只会增加，不会减少。”

毛泽东却很欣赏林一山，被他的直率执拗性格逗乐了。随后毛泽东让他和李锐各举一文，3000字，三天交卷。

1958年3月，周恩来在李富春、李先念陪同下，乘“江峡”轮驶抵荆江，林一山也一同前往，视察人员一行上了大堤，走到铁牛湾时，雾下得很大，江寒如冰。周恩来停了下来，默默地注视着这个历史上两次大决口的地方。林一山告诉周恩来，站在沙市楼房上望长江，轮船象是从屋顶经过。他进一步说：“虽然加高培厚堤防是当前主要的防洪手段，但这只是治标不治本的办法。而为了确保荆江大堤，必须尽早修三峡。”江风透骨，一阵紧过一阵。周恩来边听边点头，浓眉蹙得紧紧。他深情地告诫林一山：“我站在荆江大堤上，却感到如履薄冰，如临深渊。在三峡大坝未兴建之前，荆江大堤一定要加固加高。”

来到沙市城里，周恩来顾不上吃午饭，只匆匆吃了几块点心，便召集有关省、市负责人以及林一山，围在火炉边研究荆江防洪问题。他严肃地指着地图九曲回肠的长江，语重心长地说：“长江是个不平凡的手，不能等闲视之！我们要从全国人民利益出发，从长江中下游出发，以修建三峡大坝为主要工程，从根本上解决长江的防洪问题。”

3月7日，周恩来赶到成都。在这里召开的中共中央会

议通过了周恩来所作的《关于三峡水利枢纽和长江流域规划》的报告。

据理力争严把关 大坝屹立丹江口

成都会议一结束，周恩来就在湖北召开兴建丹江口水利枢纽的会议，确定林一山负责组织设计，湖北省委领导人负责组织施工。

1958年，那是一个一切都想大跃进的年代，丹江口工地怎能落后于形势？一心想早日建成大坝的指挥部领导们，跨越了要进行一年施工准备的阶段，提出“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就发动群众创造条件上！”原定工期不断改动，五年改为四年，继而又改为三年。

清理基础分层爆破太慢，不如干脆一炮到底！工地有人主张这么干。那样干会破坏基础，严重影响工程质量，林一山和“长办”的工程师们坚决反对，官司打到了国务院。

“坚决制止一炮到底！”国务院果断地发来了电令。

1958年12月，周恩来去湖北麻城视察的途中，明确地对林一山说：“怎么能搞一炮到底？不要因为大爆破而影响大坝的基础。”第二年8月，庐山会议结束的第二天，周恩来在庐山草坪上听取林一山的汇报后严肃指出：“丹江口破碎带一定要处理好，混凝土施工要有质量控制。这个工程还关系到长江规划实施的第一步，一定要保证工程的质量。”

周恩来的担心并非杞人忧天。在丹江口工地，轻视科学规律，违反操作规程的现象十分严重。水泥不够，多拌石头凑；混凝土不足，干脆用烧粘土；混凝土搅拌要夹冰的制度太麻烦，有人干脆提出“不吃冰棒！”“长办”工程师多次

提意见，但工地没人听得进去。

谁与科学规律相悖而行，谁就会得到与初衷相悖的结果。

丹江口大坝坝体出现了横向裂缝，纵向裂缝，表层裂缝，贯穿裂缝，严重影响了大坝的强度。浇筑块出现蜂窝、猫洞和狗洞，各种质量事故竟有400多起。

林一山听完工程质量事故的汇报，仿佛觉得急剧跳动的心头也布满了裂缝和蜂窝洞，鲜血喷泉似地往外涌。散会后，他起身踱步，独自在办公室里想了很久很久。他没想去追究谁的责任，而是在思考补救的措施。他连夜给周恩来写了一封长信，详尽地报告了工程的严重质量事故，并果断地建议：大坝立即停止施工，进行加强设计，消除隐患。

周恩来看完林一山的信后大为震动，立即电召有关方面负责人和专家赴京汇报，研究丹江口工程质量问题。

在著名的七千人大会闭幕的第二天，周恩来便亲自主持了汇报会。李先念、邓子恢、谭震林、钱正英、张体学、林一山等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开了整整一天。周恩来作了语重心长的长篇发言，反复强调要实事求是，尊重科学，反对急躁冒进说大话。

周恩来“暂停施工”的决定迅速地扭转了丹江口工地的局面。“长办”和工程指挥部齐心协力，集中力量对大坝进行加固补强工作。

1964年初，丹江口工程又面临一场新的危机。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紧缺，丹江口工程有下马的危险。

春节刚过，周恩来电召林一山进京，商量丹江口工程的命运问题。他问林一山：“丹江口还要多少钱才能发电？还

要多少钱才能滞洪？工程不干下马，要多少钱进行善后处理？”

林一山回答的很果断：“丹江口工程已经花掉投资4.2亿元，已经浇筑混凝土102万立方米，工地布置及施工机械均已就绪，如果现在停建，损失浪费很大。如果在现有的基础上缩小规模继续建设，再花3亿元即可在1969年或1970年满足防洪要求，第一台机组也可发电，从防洪和发电看都是合算的。”

在一旁的李先念笑着说：“上马和下马的钱相差不是太大，丹江口还是不下马的好。”

周恩来点点头：“人们不能一味追求高坝大库，但是，人民需要的话，还是好的。”他又问：“混凝土浇筑还要多少钱？发电设备和安装要多少钱？要分类分项一一落实。”

林一山没带这方面的资料，赶紧打电话到“长办”。“长办”的工程师们通宵达旦地进行计算复查。

夜深了，周恩来还在办公室里等这些数据。总理值班室急切地两次向“长办”挂电话催问，终于在拂晓时收到了“长办”发来的数据。

丹江口工程终于在1966年2月复工，各项工作进展的十分顺利。1968年10月1日，丹江口工程第一台水轮机并网发电。

庆祝会开得十分隆重，鞭炮轰鸣，口号震天，军乐齐奏，万众欢腾。可惜，剪彩的不是林一山。此刻，他正在汉口被揪斗，挂着“黑权威”、“黑老总”的大黑牌，赤着脚走在滚烫的沥青路上，戴着“钢盔”押在队伍前面挨批挨打。这样一次又一次，他竟没有死。他不沮丧，坚信有毛泽

东健在，胡作非为的人终究不得长久。即使在坐“水牢”期间，他也不放松研究治水工作，竟能从地下室里找到一堆水泥，一边筑坝阻挡漫过来的污水，一边思考长江边筑坝防洪的学问。

会战受挫请一山，竭心建坝斩长江

1970年3月，周恩来亲自关照和“解放”了正在接受所谓“群众专政”的林一山。当年7月，林一山再次应召进京。原来，修不了大湖修小湖，主张先上葛洲坝工程的呼声已传到北京。作为当家人的总理为慎重起见，专门请来林一山听取这位专家的意见。林一山强劲又上来了，认为按照“长办”1959年完成的三峡初设要点报告，葛洲坝作为三峡的配套工程是排在三峡工程之后的。因此只有规划，尚无设计。林一山再次强调了他研究多年的先建三峡，后建葛洲坝，或两项同建的原则意见。他明确指出：1、先上葛洲坝，将抬高三峡水位20米，给将来修三峡大坝造成更大困难。2、葛洲坝在上游尚未修建控水水库时上马，流量大，泥沙多，将会遇到前所未预的复杂问题，而且风险俱在。3、上三峡更具把握。若将三峡工程实行分期开发，其投资与葛洲坝相差无几，何不上三峡？

12月16日，周恩来在国务院会议厅主持了工程汇报会，与会者大都赞同修葛洲坝工程的建议，只有林一山仍坚持自己的方案。

据知，周恩来和有关领导多次听取了各方面的意见后，仍决定先修葛洲坝工程。当时，武钢的1.7米轧机引进工程急需强大的电源。毛泽东还出于更深层的考虑，担忧在当